

庆 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四十周年



仇 波论文选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 联合编辑
成都东方图书馆学研究所

倪 波论文选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

主编

成都东方图书馆学研究所

成都东方图书馆学研究所出版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发行组发行

(成都市总府街六号)

成都市自力印刷厂印刷

1988年

字数 100千字

印数1—1000册

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准印证88048

3.00元

简 历



1935年12月12日出生于安徽省和县雍家镇，父亲倪守炳，母亲赵有玉。少年时代曾就学于蒋氏私塾，学习儒家启蒙著作。后就读于苏氏私立崇善小学（后来改名为雍镇小学），1949年初春参加儿童团，任团长。1950年秋考入安徽省芜湖市立中学第二分部（后改为芜湖市第二中学），1951年初春一度进入青年团皖南干校学习，曾任芜湖二中学生会副主席、兼宣传部部长等职。1952年七月至九月参加安徽省中等教职员集训总队学习。1953年考入芜湖市第一中学高中部，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1960年8月至长春吉林师范大学（后改为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学专业任教。1963年11月调至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1978年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恢复招生以来，在该专业任教。自1985年以来还先后在南京鼓楼区机关干部业余大学、金陵职业大学、河海大学等许多院校兼任任教。由于工作需要，先后执教的专业课有：藏书建设、工具书与参考书、图书馆学概论、目录学、中国书史、期刊与资料工作、文献编目、文献分类、社科文献检索、世界科技发展史纲、方志学、文献信息交流引论等。此外，还曾两次被借调至南京大学中文系，从事注释与史料编纂工作。

现为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副教授。1980年以来还被聘为农业出版社特约编审顾问，以及现兼任江苏图书馆学会理事、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出版编辑委员会委员、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教研组负责人。并为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

主编、编著、编译的专著约有二十余种，撰写的文章约有一百多篇。使用的笔名有晓波、小波、石梅、百川、为民、疏影、丁一、郑强、文羊、犁播、玻璃、辣椒、明粉、柯普、落英、马

夏、绚梓、贫藏斋等。

目 次

简历·····	(I)
试论李大钊同志对我国无产阶级图书馆事业的杰出贡献···	(1)
李大钊著译系年考录·····	(15)
纪念我党创办图书馆事业的先驱者应修人同志·····	(49)
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工作的新发展·····	(60)
论高等学校图书馆改革·····	(68)
关于编写《理论图书馆学教程》的思考·····	(77)
论文献流通工作中两种流系·····	(83)
关于文献拒借率、缓借率的探索·····	(89)
多轨著者目录新探·····	(96)
论纯笔形读者目录及其他·····	(100)
也谈期刊的排架方法·····	(105)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出版之丛书的见闻·····	(110)
古籍及其著者所属朝代名称著录简论·····	(118)
浅释活字印本·····	(128)
部分论著目录·····	(131)

试论李大钊同志对我国无产阶级 图书馆事业的杰出贡献

五四运动时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以李大钊和毛泽东同志及其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创的无产阶级图书馆事业，是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大钊同志不仅是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我国无产阶级图书馆事业的创始人之一。

一、将图书馆作为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始人都十分重视利用图书馆为革命事业服务，同样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亦是如此。李大钊同志在他的一生革命活动中，曾以极大的热忱将图书馆作为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五四运动前夕，李大钊同志积极建立与支持各种进步团体。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同志为党的创立和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一九一八年一月，李大钊同志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注一)，直至一九二五年转入校长室作秘书止，从事图书馆工作长达六年之久。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李大钊同志当选为北京图书馆协会中文书记。是年他还与王光祈等人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十月他与邓中夏、瞿秋白等，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一九一九年五月他于北京大学又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小组”，经常秘密组织讨论，不仅推动了五四运动，而且也直接为次年九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建立打下了思想基础。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浪涛中诞生了。十月邓中夏、黄日葵等人在李大钊同志领导下，再次公开刊出启事，建

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注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了更好地团结党外的进步知识分子，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和掩护党的秘密活动，公开声称，“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作为目的”。为此，同心协力“搜集马氏学说底德、英、日、中文各种图书”，“但是现在图书馆底简单的设备，实不能应我们的要求。个人藏书，因经济底限制，也是一种贫乏，”（注三）于是在研究会内建立图书馆，称“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图书馆”也以英文“Communist”译音称“亢慕义斋”，又称“康敏尼特图书馆”。图书经理由全体会员公举共产党员范鸿劼担任，负责有关书刊管理流通工作。

总之，李大钊同志充分利用在当时中国最高学府图书馆从事革命活动的机会，认真学习、反复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同志、教育青年，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二、开创了我国无产阶级图书馆事业

我国无产阶级图书馆事业的诞生与发展，只有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以后才有可能。随着历史的发展，当无产阶级在一些地区建立自己的政权时，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图书馆事业整体来说，也就日趋完善与成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图书馆事业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粉碎“四人帮”，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我国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展现着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但是，无产阶级图书馆事业的诞生，决不是在一个早晨突然出现的。早在党成立的前夕，一些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创办的图书馆、文化书社，是我国无产阶级图书馆事业的先导。其中对于开创我国无产阶级图书馆事业建立特殊功勋的，当首推李大钊同志。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封建藏书楼已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而逐渐衰落走向下坡路。在封建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过渡的历史进程中，无是维新

派的图书馆活动，还是资产阶级图书馆事业的发端，都没有能最终取代封建藏书楼。太平天国的革命图书活动，是向代表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文化进行激烈的斗争。尽管太平天国的优秀儿女做了很大的努力，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也终于失败了。五四运动，不仅成为从旧民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义革命的转折点，而且也开辟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新时期。

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同志一方面着手对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改造与整顿，另一方面更着重领导与影响一些革命青年创办自己的新型图书馆。其目的在于：更好地利用图书馆阵地，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教育广大读者，使其配合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有力地促进思想解放运动。李大钊同志非常注意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他指出，“在劳工聚集的地方，必须有适当的图书馆、报社，专供工人休息时间的阅览。”（注四）在城市里，要“多办市立的图书馆，通俗的尤其要紧。图书馆宜一律公开不收费。”（注五）在李大钊、毛泽东等同志的积极倡导之下，一些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新文化为己任的工人图书馆、大众图书馆、进步团体图书馆等，如同雨后春笋般纷纷创立起来。一九二〇年，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创办的青年图书馆、文化书社，北京大学通信图书馆。恽代英在武昌创办的利群文化书社。一九二一年在毛泽东同志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内附设有图书馆。长辛店俱乐部阅览室。天津工人图书馆。方志敏的南昌文化书社。上海共进图书馆（后改名为上海通信图书馆）。一九二二年建立的有唐山工人阅览室；一九二三年建立的有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图书阅览室，以革命导师马克思命名的“马氏通信图书馆”等。这些图书馆和书社的诞生，就其性质而言，他们既根本区别于封建藏书楼，又根本区别于资产阶级图书馆，而是属于无产阶级图书馆事业的范畴。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毛泽东同志领导工农红军

和革命人民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创立了革命根据地，于是在我国出现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政权。从此至建国为止，形成了两条战线上的进步与革命的图书馆：一是在革命根据地内形成了无产阶级图书馆事业，一是在敌战区内仍然零星保存着某些进步的与革命的图书馆。例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有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中山图书馆、红军系统图书馆，苏区民众图书馆等。在国民党区内有蚂蚁图书馆。抗日战争时期，仅以延安地区为例，各类图书馆基本上齐全，并成立有图书馆协会。解放区内许多党政领导人兼任一定的图书馆领导职务，例如，董必武、徐特立、吴玉章等兼任中山图书馆理事，贺龙等兼任晋绥图书馆董事（注六）。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区内的图书馆事业，随着解放区的迅速扩大有着很大的发展。此时国统区内的进步图书馆冲破白色恐怖显得特别活跃，如北京大学的子民图书室、上海的中华业余图书馆等等，直至建国以来的我国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都继承和发扬了李大钊等人开创的无产阶级图书馆事业的光荣革命传统。

在李大钊同志所从事图书馆工作的伟大实践中，可以找到我们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的指导思想、办馆方针与办馆路线，在我们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中将永远活着李大钊等先烈的革命精神。

三、传播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图书馆事业 一项重要任务

早期的李大钊是一位革命激情横溢的急进民主主义者。十月革命以后的一段时间，即从一九一八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以后至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是李大钊思想发展从急进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转变时期。他对于震撼世界的伟大十月革命的歌颂，便开始了他向共产主义者转变。他充分利用图书馆丰富藏书这一优越的条件，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同时，又以革命者的战斗姿态，设法逐步改造图书馆，使其

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在这段时间里他写了许多著名论文。如：一九一八年七月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是他公开宣布十月革命的第一篇论文。接着同年又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两篇著名论文。这些文章既是他宣布十月革命的开端，也是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开端。李大钊同志对于十月革命的这种观察、研究和宣传，逐步引导和启发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的认识、研究和宣传。一九一九年五月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这是标志他比较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开始。他为了寻找中国的出路而去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他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问题而去宣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为了适应当时斗争的需要，他还使用了李钊、守常、孤松、剑影、明明、冥冥、猎夫、琴华、常、剑、L.C.C.生、S.C.生、T.C.生、T.O.C.、F.O.、L.S.C生等笔名先后写了许多种著作与译文，不下四、五百篇的论文。

李大钊同志将传播马克思主义列为图书馆的各项工作的首要任务。他千方百计地收集了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其他许多进步书刊，以此作为向读者宣传推荐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前提。

一九一八年十月北京大学红楼建成后，图书馆由马神庙迁入红楼。此时毛泽东同志经杨昌济教授的介绍，与李大钊同志会见，并共同从事图书馆工作达四个多月。李大钊同志主持工作下的图书馆，是在马克思主义书籍非常缺乏的情况下，为先进知识分子提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良好场所。那时我国人民要了解十月革命的真相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容是十分困难的，往往只能从东西方外国报刊上经过歪曲的零星报导中有所了解。为此，李大钊同志通过各种渠道向读者及时提供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介绍十月革命的外文书籍。如，马克思、恩格斯的《Communist Manifesto》（《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哲学的贫困》）、《Wage Labour and

《Capital》, (《雇佣劳动与资本》)、恩格斯的《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The Books on Socialist Philosophy》(论社会主义哲学)、列宁的《The Infantile Sickness of Leftist Communism》、(《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无产阶级革命》)以及《Soviet Russia》(《苏维埃俄罗斯》)、《The New Russia》(《新俄罗斯》)。李大钊是读者的良师益友,许多青年读者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逐步成长起来,走上革命的道路。一些进步的、革命的团体在图书馆内开展活动,他的红楼办公室经常成为革命青年集会的地点;许多有关宣传马克思主义,指导当时革命斗争的报告会、讨论会、学习会,在图书馆内非常活跃的展开着。

五四以前,由于反动当局的造谣与恫吓,社会上有许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既不了解又很害怕。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毕竟还只是少数,一些热心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青年则常常是秘密进行的。对此,李大钊同志经常给予他们一些指导,有时综合地介绍,如宣讲《马克思经济学》,有时就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一著作进行阅读辅导,如宣传马克思的《资本论》;根据斗争的需要,有时进行公开的讲演,有时却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宣传。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增强宣传效果,李大钊同志还支持青年们自己创办图书馆。此外,他除了自己先后主编一些报刊外,还协助全国学生救国会创办了《国民》月报、协助北京大学学生创办了《新潮》月刊等。他又将在图书馆内宣讲的许多内容,整理后拿到报刊上公开发表。总之,努力传播马克思主义,是李大钊同志为我们指明了无产阶级图书馆事业办馆的基本原则;积极开展各种活动来宣传和推荐优秀图书,是李大钊同志为我们树立的如何开展读者工作的杰出典范。

四、妥善处理“藏”与“用”的关系

图书馆是搜集、整理、保存和传播人类文化知识的宝库，是向广大读者进行文化教育的阵地。图书馆工作的特有矛盾性往往集中地反映在“藏”与“用”上，“藏”是图书馆开展各项工作的前提和条件，“用”是图书馆开展各项工作的目的和成果，二者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相互依存。李大钊同志十分重视藏书建设工作，着手扩大书源、补充新书，使中文书籍迅速增加到二十万册。在如何对待“知识”与“愚暗”问题上，他认为真正的“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塔，愚暗是达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障碍”，“只要得了光明与真实，什么东西，什么境界，都不危险。”（注七）因而，在他主持图书馆工作期间，购买了大量介绍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中有许多马克思主义原著外文版，迄今已成为珍本，他坚持优先收藏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著作，他说，“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以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注八）。

在书刊中反映出来的新旧两种思潮，李大钊同志曾多次用“车有两轮”、“鸟有两翼”的生动比拟指出，它们必须是代谢的，不是固定的；是合体，不是分立的，二者互相挽进、互相推演着。“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应该知道和他反对的一方面并存同进，不可妄想灭尽反对的势力，以求独自横行的道理。……我又确信这两种思潮，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方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注九）主张无论是对待真理还是对待谬误，采取禁止的方法都是不可取的，因为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假如它是真理，“硬要禁止他，不许公然传布，那是绝对无效，因为他的原素仍然在情理之中，情理不灭，这种学说也终

不灭。”即使你动用了监狱、刑罚、杀头，“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倘若它是谬误，也大可不必采取简单的禁止办法，“因为大背情理的学说，正应当让大家知道，大家才不去信。若是把他隐蔽起来，很有容易被人误信的危险。”（注十）这样做的目的，是让革命的思想在斗争中，“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注十一），要在政治、社会、文学等方面，开辟一条新径路”；“打破矛盾生活，脱去二重负担。”（注十二）至于说，那些一般具有不同风格、不同形式、不同学派和不同学术观点的著作，更应尽可能地都得到应有的收藏与反映。

五四运动期间的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是冲破思想僵化的号角，是冲决封建堤防的洪水。李大钊同志也非常关心自然科学著作的收藏与自然科学知识的普及，北京大学图书馆注意珍藏那些自然科学诸学科的基本著作、代表作和教科书。一时如量子能、相对论、遗传学等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也在我国得到空前传播。这种自然科学知识的大传播，是作为打倒孔家店、抨击吃人礼教，宣传唯物论和无神论、解放思想的有力手段，是作为社会革命的一种理论武器被提出来的。既然，自然科学领域内一些理论都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那么被统治者奉为天经地义的东西，理可当然的也“未必永为天经地义”，反之被统治者污蔑为邪说淫辞的，“则又未必果为邪说淫辞。”（注十三）

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总是由低级走向高级的不间断的历史过程。要创造和发展新文化，就必然要以前人所积累的资料和人类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为前提。不应当割断历史、不能全盘西化、不能盲目排外，拒绝向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学习。李大钊同志指出，中国封建文明处于衰颓，西方资产阶级文明濒于危机，惟有十月革命开创的“第三新文化”（注十四），才有可能兼采东西文明之长，走自己独特的道路，创造无产阶级

自己的文化。他将收藏外文书刊提高到重要位置上来加以统筹考虑，他批准和经手补充的外文书刊就很多，其中西文书有二万册，日文书有千余册。北京大学图书馆作为一个高等学校图书馆来说，尤其重视外文教科书的收藏与使用。将新入藏的外文图书，公开展出，以便师生到馆阅览或借阅。

五、加强科学管理，方便读者使用

图书馆的各项业务工作，说到底是如何妥善处理好“藏”与“用”的关系。图书馆要让读者更好地使用藏书，就必须从图书的登记、分类、编目、典藏，到流通阅览等各个环节都要加强科学管理。力求做到“藏”而不死、“用”而不乱。李大钊同志重视从方便读者使用的角度，来加强图书馆的科学管理。

为了使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具有系统性、代表性和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李大钊同志还专门将书“登录”、“购书”分别设课（相同于组或部），占全馆组织机构共四课的一半。“登录课”的设置，确保了广泛征求、认真采纳师生读者对于订购书刊的意见，及时满足学校的教学与科研的需要。通过对每一册图书的登记、分配、以及注销情况的记录，保证图书财产的完整。利用对书刊的准确的登记，作为拟订计划、总结工作与进行图书补充时的依据，“购书课”的设置，从图书馆实际出发，做好书籍、报纸和期刊的访求、预订等工作。

图书分类工作，当时最大的困难是我国原有的四库法（即《四库全书总目》分类法）难以类分日益增多的新著作。李大钊同志竭力主张改编图书目录，由于条件的限制，后来采用麦维尔·杜威《十进制图书分类法》（即《杜威分类法》）组织西文图书卡片目录。“编目课”负责书籍、小册子、期刊、图表目录的编制工作，有时还将图书书目经过整理之后刊载于《北京大学日刊》向读者进行推荐。

读者工作是图书馆诸项业务工作的中心环节。李大钊同志深刻指出，“古代图书馆不过是藏书的地方，管理员不过是守书的人，他们不要书籍损失，就算尽了他们的职务。”与封建藏书楼相反，现代图书馆是“研究室”，管理员不能只保存书籍，还要使各种书籍发生很大效用。”图书馆的社会作用非常突出，要“想教育发展……非依赖图书馆不可”（注十五）。读者工作开展得好，图书馆的社会作用才能更好地被发挥出来。因此，图书馆应最大限度地方便读者。在借阅方法上，尽量考虑到节省读者宝贵的时间。他在虚心听取读者意见之后，又经过一段试验，不赞成“文库式”，而认为“开架式”是一种好办法。在实行开架时，仍需大力加强分类目录的组织工作。“典书课”除专门负责典藏、流通阅览外，还主管各种“参考材料指导及介绍”等宣传辅导工作。他对于业务工作的要求非常严格，对于偶而不慎出现的错分、同书异号、异书同号，随时发现便随时更正；对于改编图书、更换书标等工作，常常利用假日进行彻底更改。书库的清点，几乎每年寒假都要例行一次清理。

图书馆的规章制度是开展各项工作的准则。李大钊同志对全馆工作通盘考虑、统筹安排，并主持制定了总的条例和若干细则，使得全馆上下分工明确、有条可依、有章可循。一个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只能来源于实践、来自群众，便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得到群众的拥护。他广泛征求群众的意见，尽量集中读者的合理建议。许多重大问题，他总是先提请图书馆委员会认真研究、充分讨论，然后形成决议。他很重视图书馆的各种统计工作，可以说做到日有总计，年有总结，以此作为检查工作，提高服务质量和鞭策工作人员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重要方法。

李大钊同志狠抓图书馆的科学管理，可以概括为：狠抓图书馆计划、狠抓图书馆组织机构、狠抓图书馆规章制度、狠抓图书馆的技术和狠抓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培养与提高等五个方面。其

中，他特别强调关于图书馆工作者的文化科学水平的提高与独立工作的能力，他建议北京高等师范增设图书馆学专业。他认为，“使管理图书的都有图书馆教育知识”，“这是关系到中国图书馆前途的事情，也是关系到中国教育前途的事情。”（注十六）一九二〇年，李大钊同志亲自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讲授《图书馆学》课程，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一日于《晨报》发表《美国图书馆员之训练》一文。一九二四年九月上旬，利用他出席共产国际五大机会，在对列宁格勒作为期一周的参观学习时，还特地考察了图书馆（注十七）。所有这些，都充分证明他对图书馆工作者业务水平的提高，非常关心。

应该说，李大钊同志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重要措施，为我国无产阶级图书馆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是，这决不等于说当时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就是属于无产阶级图书馆事业的性质。那种把李大钊同志开始主持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作为我国无产阶级图书馆诞生标志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这是因为：（一）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甚至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还并没有建立之时，还远在五卅运动前的一年多，就出现了我国无产阶级图书馆事业是不可能的。（二）李大钊同志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总的来看，直到一九一八年初，这一转变过程尚未完成。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直接创办了无产阶级性质的图书馆，起码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三）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性质，无论怎样还是取决于北京大学的性质，首先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确认五四运动以前的北京大学，就已经属于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大学了。

李大钊同志的光辉一生，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并对于我国无产阶级图书馆事业的开创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李大钊同志对我国无产阶级图书馆事业的杰出贡献，就在于他将图书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坚决反对那种

超阶级、超政治的资产阶级观点；就在于他最早将宣传马克思主义，列为图书馆工作的首要任务；就在于他高度评价了图书馆的教育意义，和深刻论述了图书馆的社会作用；就在于他提出了图书馆应妥善处理古今中外科学成就与文化遗产；就在于他在实践中，为加强图书馆的科学管理而坚持不懈的努力；就在于他非常重视开展图书馆学的研究与举办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对图书馆工作者提出了殷切期望与严格的要求。在李大钊同志的许多遗文中，为我们留下极其珍贵的有关如何办好图书馆的论述。是我国丰富的图书馆学遗产中的宝贵财富。

我们缅怀先烈——李大钊同志的丰功伟绩，也就是对林彪、“四人帮”的有力批判。万恶的“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推行其反革命政治纲领，竟然疯狂地污蔑李大钊同志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叛徒”，推倒墓碑，残酷迫害其子女，使其长女双目失明……。李大钊同志的道路，代表着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成长的共同道路。也毋庸讳言，李大钊同志也确实受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然而这一切并没有阻挡李大钊同志的前进，恰恰相反，由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正是民主主义时期共产主义者思想发展的共同规律。“他的遗文却将永在，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注十八）李大钊同志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而勇敢地走上绞架，牺牲时不过三十八岁。李大钊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我们学习李大钊同志，就是要继承革命传统，在党中央领导下，努力办好我国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服务。

附志：本文原有《李大钊著译系年考录》部分，脱稿于三月。由于份量过大，篇幅太长，《考录》部分另行印刊。本文曾在中国图书馆学成立大会上作为书面发言，这次刊登，只作了个别改动。

一九七九年八月于龙盘里书斋